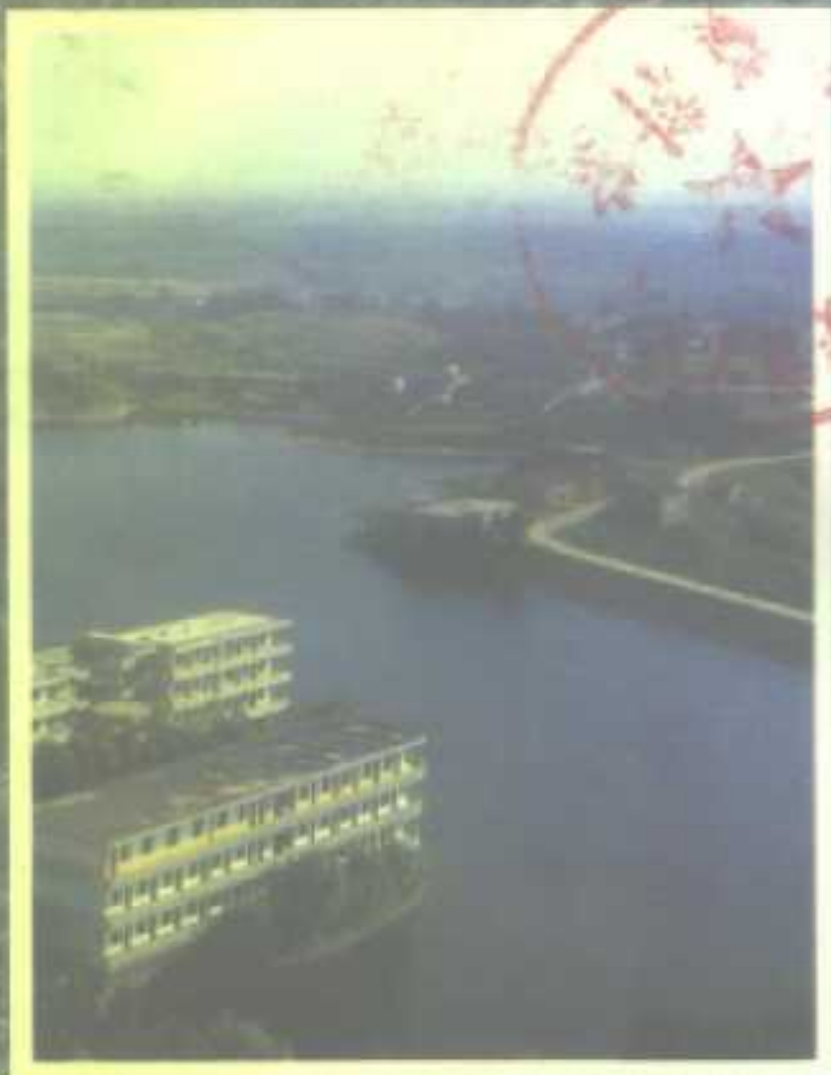


孝感水利

孝感文史资料第五辑
水利史料专辑



孝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孝 感 市 水 利 二 编

孝感水利

(孝感文史资料第五辑·水利史料专辑)

政协孝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孝 感 市 水 利 局
一九九八年八月

文史资料委员会

顾 问 吴绪坤 夏正峰
主 任 刘家瑞
副主任 胡新荣
委 员 王木生 艾天明 刘四毛 黄守斌 殷贤彬

孝感文史资料

(第五辑·水利史料专辑)

主编 王乱记 编辑 王腊成

孝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孝感市水利局出版

孝感市水利局印刷厂印刷

* * 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4印张 270千字

1998年8月出版 199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2000册

鄂孝图内字:[98]35号 ¥:1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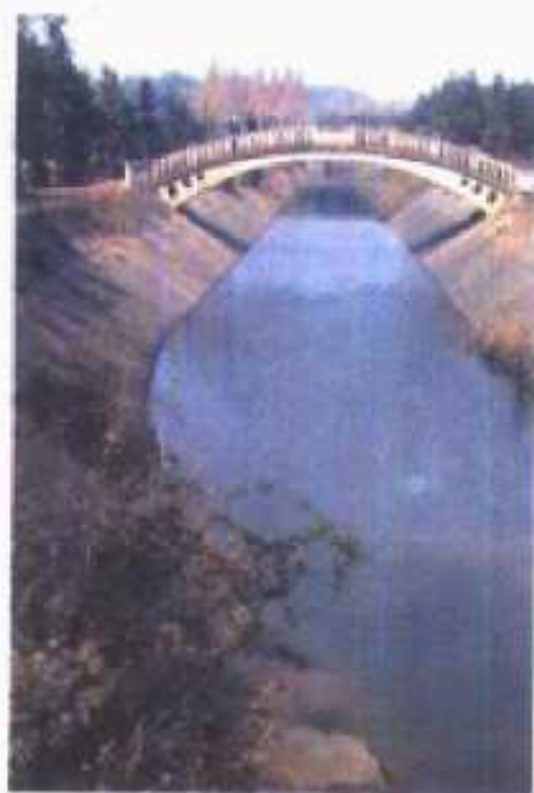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3月6日，董必武在王任重、张体学陪同下
视察徐家河水库大坝施工现场。



1995年12月，彭佩云视察汉北河。



孝感市防汛水利大楼



郑家河水库总干渠测流桥



汉北河排洪工程



广水市花飞灌区南门渡槽



汉川泵站二泵站



安陆市解放山府河第一坝

综合治理汉北河



目 录

民国时期的几次旱涝灾害	
..... 李祚石 张金芳 王世伟(执笔)(1)	
1941年大旱与“千塘百坝运动”	
..... 汪立波回忆 王尔撰写(8)	
1952年大旱与抗旱斗争	
..... 王世伟等回忆 燕雪撰写(21)	
1954年特大洪水与抗洪救灾	
..... 李述祖 王世伟等回忆 王乱记撰写(33)	
1958年的特大雹灾	易 冰(52)
1959年—1962年的旱涝灾害	李瑛 王乱记(57)
1978年—1980年的旱涝灾害	林 泉(71)
1991年抗洪救灾纪实	王膳成(82)
“96·7”抗洪纪实	郑 后(88)
“7·18”大转移	吴道本(105)
“96·7”生活救灾与思考	刘细托 俞天胜(114)
“98·8”民乐闸抢险	易 冰(120)
府河改道	章天霖(136)
难忘的府河改道	梁荫国(144)

汉北河改道·····	杨茂延(169)
新开汉北河暨天鹅垱茫洞湖治理·····	郑运金(176)
“两河一湖”治理纪实·····	张松阶(185)
治理大富水·····	张松阶 张业才(198)
解放山水利工程的最后决战·····	但尔恕(205)
女儿港改道·····	汤伯顺口述 操金庭 邹存宽整理(210)
综合治理汉北河·····	王天予(214)
综合治理府怀河·····	燕 雪(231)
汉江堤防建设·····	川 文(236)
建设徐家河水库的回忆·····	
·····	陈克明口述 吴经铎整理(248)
郑家河水库的修建·····	高今升(258)
郑家河水库大坝施工琐记·····	高义富(263)
高关水库建设追忆·····	陈世高(270)
花山水库修建的前前后后·····	何顺玉(276)
飞沙河水库一期工程·····	廖 彬(283)
金盆浴鲤水库·····	罗继卿(288)
观音岩水库的修建及对所出现问题的处理·····	
·····	蒋志刚(291)
滚子河水库·····	杨传楷(297)
两河水库·····	李先润 李仁建(304)
汉川闸兴建经过·····	汪福善(307)
兴建民乐闸的回忆·····	刘年生(310)

龙赛湖闸修建记·····	杨金发(313)
汉川二泵站建设情况·····	李为民(319)
野猪湖泵站·····	肖南文(324)
夹河沟泵站·····	李文锦(326)
金泉泵站扩建前后·····	曹明高(330)
花山水电站和飞沙河二级水电站的建设·····	易大绩(339)
汉湖“退田还湖”的经过·····	张元友(347)
治水造田在郝店·····	王天银(354)

民国时期的几次旱涝灾害

李祚石 张金芳 王世伟(执笔)

原孝感县的版图很大,北抵今大悟县境内的汪洋店一带,南到武汉近郊姑嫂树,都由孝感管辖。其大致地形是北高南低,东北部多山易旱;西南部低洼易涝,常受汉水、府河江水倒灌之苦,虽有堤垸,但因为年久失修亦难阻御。在人们记忆中,从民国 20 年(1931 年)到 37 年(1948 年),就有 5 次大旱灾和洪涝灾害。当时,旧政府当局无奈于万一灾民“饥饿难挨,后患何堪”的考虑虽也搞过赈济,但不能救生灵涂炭于万一。那“逃者既不能归,居者行将饿死,啼号满路,乞食无门”的惨景惨象,至今想起来仍叫人心酸。

一、民国 20 年(1931 年)大水灾

是年夏,霖雨兼旬,山洪爆发,不独东南三乡九十余会(当年地方行政区划的称谓)尽痛陆沉,即北乡之高阜平畴,亦遭淹没。当年灾情为全省三十六个重灾区之一,南垸北岗被淹两次,南部受灾尤重,灾民人数 347647 人,急待振济人数 13 万人,受灾面积 8359 市亩。当年 9 月《湖北水灾报告》对孝感灾情中所说:“所有三汉埠、北涇嘴、黄孝河及城郭附近之彭家湾一带居民,须臾之间,忽因水势逃避不及,

男女老少多被淹没，其中有存者多踞屋顶，或攀树梢，哀号之声，惨不忍闻……”

灾后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急电南京行政院内政部，电文称：“…襄江两岸及各内港支流所有官堤民垸，非漫即溃，让庐舍荡折，禾稼尽淹，滔滔江汉一片汪洋，淹死者一棺莫获，逃生者回顾无门，浩劫空前，言之鼻酸。受灾最严重呈报到府者计有汉口、武昌、云梦、孝感、应城、汉川……等三十六县……”

爰由“湖北省赈务委员会”赈济孝感县大米六百石（等于十八万斤）。

二、民国 23 年（1934 年）大旱灾

这年，水旱交加，南乡春季霪雨，夏粮受渍，入夏，骄阳肆虐，两月不雨。三汊埠以北，纵横百里，寸土皆赤，颗粒无收。东北乡五区（周家巷一带），六区（小河一带）灾民代表万静斋、刘鹤山等七人联名向湖北省民政厅报告了灾情，电文说：“东北罹此奇重灾害，正值青黄不接之时，逃者既不能归，居者行将饿死，啼号满路，乞食无门，惨目伤心……”请求救济，并免田赋。省民政厅指令应山县长勘查具报。而该县长只派其署内职员刘惠波到县。孝感县长欧阳洪烈竟随派一人引导应山来员，仅勘查邑南乡滨湖田地，再由三汊埠乘火车至花园草率一观，只见“秋禾葱翠，麻豆有收”，遂以全县不成灾上报了事。于是，奇离之事由此发生，县长欧阳洪烈竟贴布告于四乡，谓“根据勘查报告，本县秋收颇可，不成为灾，田赋应照常完纳。”致使东北乡灾民免赋不成，救济无望，灾民纷纷南来乞食，后由县商会主席廖竹泉及各法团

士绅罗逵、沈颀康等七人联名致电国民党的省主席张群、民政厅长孟广澎，为民请命。先后向省府、省民政厅发出快邮告急电文四件，有则电文痛切陈词地说：“孝感东西北三部，青苗变成枯草，赤地皆属良田。十室九空，民食何托？由是扶老携幼，乞食城南。而南乡面积狭小，又半遭水灾，何能移粟他人？兹值迂此天灾，遍野哀鸿，嗷嗷待哺，万一饥饿难忍，后患何堪……”经过几番周折，才由“民政厅”、“财政厅”派员重新会勘，拨下赈洋二千，一场大旱灾的救济乃告了结。

三、民国 24 年(1935 年)大水灾

这年七月一日，江水倒灌，县河水位逐渐登岸。七月十日，襄水忽自西南滚滚流入，水头高约丈余，比民国二十年(1931 年)水位尤高三尺，东西南三面二百余堤垸，完全淹没，并波及北面岗乡三十余华里。

淹没面积：1057.80 方公里，受灾农田 3688 市亩，受灾人口 204449 人。

损失概况：淹死的人口和牲畜无准确统计，但逐日可见随水飘荡倒塌房屋的梁柱门板与浮尸、死畜。

灾民流离惨状：有的不及救援而死者，有全家以绳连贯而死者，亦有将儿女投水然后自溺者。至于逃出被救的灾民，随地露宿，啼号震耳，成群灾民，无地收容，乞讨四方。卧龙潭人饶鸿绍带领全家人逃荒，还唱着悲惨的《荒年歌》：

“……

老天爷涨襄水一齐淹死
打开了襄河堤如天倒灌

众人等见水到魂飞魄散
一个个想活命难上加难
父救子子救父哭得好惨
母救女女救母说也心寒
淹死人无计数随水飘烂
有浪打和沙埋尸骨堆山
……”

救灾的经过：地方以事出意外，措手不及，乃由地方热心公益人士出面办理赈济，设场施粥，然聚集在县城未被水淹的北正街及城墙上的灾民竟达4万多人。街满巷盈，露宿啼饥，触目皆是。

县商会及各法团，连续七次致电恳求：“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，武汉行营主任张群及省民政厅长孟广澎求救。其中一份电文说：“本会竭蹶经营，分设粥场，兼施馒头，甫及三日，业经耗去五千元（笔者注：五千法币相当五千银元），现已力竭声嘶，点金无术，迫不得已，恳钧座俯察下情，急拨急赈款下县……”，后由“省水灾救济总会”拨下急赈洋三千元。但因僧多粥少，无从分配。乃由“县水灾救济分会”再次急电，请求增拨。电报称：“急赈下县，未能及时散发之原因，以急赈三千元，分配二十万灾民，发银每人不满百文；发粮则每人不及三合（笔者注：相当一市斤），共分多次，极感困难……。”但“总会”以“候赵委员复查核夺”，批复了事。

与此同时，县商会以全民的名义，向“省主席”急电告急，电文说：“县城被水包围，四面汪洋，交通断绝，恳请飞调快轮来县，藉维交通，并恳速施急赈。”省里派一只火轮来

县,但该轮吃水较深,不能直达各垸村庄,当即返航。便又向省里急电要求:“可否改变方略,仍派该轮来县拖运灾民赴汉,就近救济或听其自谋生计”。如此恳切呼吁,亦未为当局所重视。

地方见向官方求救困难重重,乃向孝感旅省、旅汉同乡会、花园商会、汉口华洋义赈会、汉口普济善堂以及县城乐善好施人士呼吁,得到孝感旅汉人士祝庸斋、祝存照兄弟遵其父嘱捐丧葬费用一千元赈饥;各界人士捐大洋三万五千元;驻孝国民党军 105 师(东北军系张学良嫡系)炮兵营和汽车队先后施粥三日,商会购到大米 36 万斤。还收到汉口刘天保堂药局等三家所赠救济水一万七千瓶(省救济会只发了二千瓶),救疫散、长春丹八百包,普济善堂赠驱疫散五百包。上述款物概由邑中人士罗善夫、屠俊凡、廖竹泉等十四人组成的“孝感水灾救济分会”自始至终监督发至灾民。

国民党政府在这次大水灾中除发下急赈洋三千外,另发寒衣一千件,按当时有 125 个保受重灾,每保一百户左右,一个保只能领得寒衣八件,实难分配。另外,发了以工代赈款 16000 元,不敷开支,“县救济分会”向“省总会”报告说:“全县有 200 余堤垸溃口需土方 45 万有余,按每方补助洋 1 角 5 分,尚差银 5600 元有奇……恳请恩施格外”,可是省府未作批复。

四、民国 29 年至 30 年(1940 年至 1941 年)大旱灾

民国 29 年至 30 年(1940 年至 1941 年)孝感遇到六十年未有的大旱灾,有的地方几乎颗粒无收。孝感县抗日民主政府,为使群众渡过难关,提出“有田出米,无田出力,以工

代赈，共渡荒年”的口号，组织群众，大搞生产自救。一是开展“互供互助”。两年中共借出口粮、种籽三千多石，解决了缺口粮、缺种籽的困难。二是以工代赈，动员富人出粮，发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也避免了群众四处逃荒。三是兴修水利。据当时孝四区统计，修塘修堤共用工一万零一百多个工，改善了生产条件。四是创办妇女试验区，发动妇女开荒、春耕、喂猪、养鸡、纺纱织布，增加了群众的收入。

而在沦陷区，日伪汉奸照例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置救济灾荒于不顾。民国30年(1941年)夏，日伪“县长”朱坤宇象煞有介事地在城隍庙设“祭坛”，“祈祷上天，普降甘霖”。限令各保请道士“做法会”“打旱魃鬼”，全城肉案“禁屠”、“抬狗老爷游街”欺骗人民的迷信活动。但对来城逃荒的，却令各商户摊派赈洋，按出钱数额换取用竹签做的筹码，灾民上门，叫苦连天，才要得一筹码，每十个筹码换一碗稀饭，这个场面叫人实在心寒！

五、民国37年(1948年)大水灾

民国37年，全县共辖28个乡镇。这年8月，县西南乡水灾严重，有15个乡镇受灾，溃决民堤44处，40多万亩农田被淹。

这年8月2日，《武汉日报》记者聂费隐报道的《孝感灾情》中说：“此次灾情，较之民国24年水灾不差上下，河水退落当在八月份以后，依目前情形观察，秋收已经绝望，前途之严重，不堪设想。”报道还详细说到当年灾害特多，而军差又急如星火，他写道：“屋倒偏逢连夜雨，船破却遇顶头风。孝感今年灾情奇重，人民生活水深火热，灾黎生命朝夕不

保，城中居民，好象热锅上的蚂蚁，焦灼万状，无奈“戡乱”军事吃紧，军差又急如星火，令到必行，不得稽延，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。”

这位记者特地走访了当时的国民党孝感“县长”田江昌，询问军差和水灾救济等问题。下面是田江昌对记者的回答：

“近来大军过境，军差在所难免。此次由县府筹借军用柴费三十亿（笔者注：金圆券）约可供驻军三日之用。……据此数目估计，月内约需柴草费 300 亿，目下不胜焦急之至。”

这时，南北灾民达 25 万人，颠沛流离，无人问津。孝感旅省同乡会、旅汉同乡会，先后向“省参议会”、“省政府”呼吁求救，“省政府”批复说：“本府电飭动用历年征存备荒积谷办理，并另案拨发赈款 20 亿……”但事实上，灾民却在四处逃荒。这位记者在报道的结尾用了“赶快想办法”的小标题为民请命。文中说“孝感的灾难，急如燃眉，灾民急待赈济，人民请求减轻负担，地方行政官吏急得焦头烂额，一致希望省府赶快想点办法，解民倒悬，协同地方人民组织赈济机构，急救灾黎。”